

04.04 Y-32/1

# 长治文史资料

(长治市)

85年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14

# 目 录

蒋机轰炸长治的罪行	游生全	( 1 )
回忆在长治敌工站	李福海	( 4 )
巧取高河敌据点 ——记高河伪军里应外合反正起义的经过	申大顺	( 20 )
兄妹合作 为党工作 ——我们做地下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二洪	( 30 )
在合法身份掩护下 对敌展开斗争 ——回忆长治城内地下工作片断	郭印则	( 37 )
将计就计 开展地下工作	王凤桐	( 42 )
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治国民	程 裕	( 47 )
忆战时生活 盼台湾早归	白君燕	( 51 )
程如壁先生生平事略	程 裕	( 54 )
我的回忆	荆 润	( 62 )
长治国民皮毛业	程 裕	( 75 )
玉堂春的故事	陈魁文	( 80 )
长治市城区革命纪念地	郭长安辑	( 82 )
《城区文史资料》之一更正		( 85 )

# 蒋机轰炸长治的罪行

游生全

威震中外的上党战役结束不久，古城人民正沉浸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除奸清算，建立政权，发展生产，到处是欢声笑语，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

就在人们兴高彩烈喜迎春节的时候，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惊呆了全城人民。这是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协定，妄图卷土重来的又一阴谋，派出飞机向上党人民投下了第一批罪恶的炸弹。

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共长治市委（当时驻地在南大街锡坊巷，称工作团），在书记杨绍曾同志（当时称政委）的领导下，立即出动。一边指挥机关人员防空，一边指派我们在身边的几个人到各街、各区发动群众隐蔽。突然，一架蒋机又向机关驻地附近直冲过来，往炉坊巷二号院又扔了一颗炸弹。顿时烟雾弥漫，墙倒屋塌，百姓们有哭有叫，鸡飞狗吠一片混乱，气氛异常紧张，笼罩全城。奉杨书记的命令，我立即赶到二号大院一看，郭宋义的五间楼房被炸塌三间，楼下正在粉刷做活的两个男同志被压在倒塌了的楼下面。于是我一方面动员小孩妇女尽快隐蔽，以防再袭，另一方面又动员周围

男同志挖土救人，由于抢救及时，被压的两人才免于一死。正忙中，忽然又有人喊叫道：对面九号院也扔下了一颗炸弹，又炸塌了三间楼房。于是我又急忙赶到九号院组织人抢救。到了那里一看，炸的更残，三间好端端的楼房被炸成一片废墟，弹坑就有两丈多深，五个老人有两个被活活压死，另三个人因坐在大梁附近，大梁塌下来悬在空中被架住，才免于一死。但这些老人也被吓的目瞪口呆，不醒人事。事后统计，蒋机这次轰炸长治共扔下二十六个炸弹，除有七个未爆炸外，其余的共炸塌民房、铺房一百六十余间，炸死炸伤居民数十人，给刚刚解放的上党古城人民又一次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敌机刚离开长治，市委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市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一方面帮助受害居民处理后事，医治创伤，另一方面尽快进行疏散，积极开展防空、防特活动。市委、市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都在早上出城到南门外东山跟、壶口、石槽、山头、小庄等防空，晚上进城处理公务，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以防敌机再次空袭。

不出市委所料，二十多天后的三月上旬，蒋介石反动派的飞机再一次向长治城狂轰滥炸。这次轰炸，我们看得更清楚。也是上午十时左右，这天我和市委副书记李堂、文印员魏文壁同志在值班，听到由远即近隆隆声，我们便立即向有关单位发出防空信号，并紧急撤出机关向防空洞跑去。当时城内唯一的防空洞就在现在的线带厂南墙外地区体育场内，西墙跟原发豆芽的窑洞。当我们从锡坊巷机关出来，刚跑到炉坊巷小十字，就看见六架敌机由南到北排成一排飞到我们头顶，谁也不敢再跑了，大家只好就地爬倒。紧接着敌机便疯狂

地利用机枪横扫，继而便乱扔炸弹。瞬息之间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响彻全城。没有出城的群众呼喊嚎叫乱作一团，东跑西窜不知所措。好端端的建筑物，立时墙倒屋塌，砖瓦飞扬，尖土烟雾笼罩全城。事后统计，这次轰炸造成的损失更大，六架敌机共扔下炸弹六十六枚，炸毁房屋二百八十余间。这次敌机轰炸长治城是有重点目标的，主要是对准地市首脑机关和重要设施部门（这说明有敌特呼应）。如其中有市委驻地锡方巷、市政府驻地稷山巷、地委机关驻地天主堂，有行署驻地大北街耶稣堂、以致野战仓库（现在粮食局大库）自来水厂等地，附近都投放了数量不等的炸弹。尽管市委天天动员防空，时时强调防空，但仍有五人受伤，四人被炸死，我也险些受伤。当晚市委秘书长孟宪德同志返回机关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小游，让你受惊了，叫你出城你非要坚持值班，你看危险不危险？”（我当时担任孟秘书长的警卫员）。是的，当时白天在机关值班确实有危险，但是只有我们坚持值班，才有可能让首长们去处理公务和完成更多的大事。

敌机两次轰炸长治所造成的灾难，人们将永远记在心上。自然，一切同人民为敌的反动派总归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在这之后，长治人民支前运动更加高涨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彻底灭亡了。

我们在经过四十多天防空生活之后，才又回到了市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恢复创伤，发展生产，除奸清算，支援前线，建立政权的群众运动。

（本文作者为城区政协副主席）

## 回忆在长治敌工站 怀念为解放长治而献身的敌工战士

上党战役的胜利，长治的解放，已经过去四十个年头了。回忆往事，记忆犹新的是，一九四五年长治解放后，敌工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的十月的一天，在太行四分区敌工站站长王培仁同志召集敌工站全体同志总结工作的时候，我们敌工站的全体同志都为从那苦难的岁月中取得胜利的庆欣而激动，同时也不约而同的默默地流下了悲痛的眼泪，为那些为解放长治和太行山区而献出生命的敌工战线上的革命英烈而哀思！长治和长治地区的解放是我党我军上党战役的伟大胜利，也是我党我军和长治地区的人民同日、伪、顽长期斗争的成果。但是这个胜利成果凝结着无数革命英烈的鲜血，也凝结着敌工战线上革命英烈的鲜血。

长治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处太行、太岳两个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腹心。日寇为扑灭我党我军的抗日力量，于一九三九年再度向我上党地区大举进犯，侵占了以长治为中心的大片国土，控制了上党盆地，控制了晋、邯长交通要线，分割了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切断了我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后，为把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

其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加强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则实行反共投降政策，多次策划了反共阴谋，配合日寇向我党我军进攻，使我党我军受到了严重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加强对敌斗争，党中央号召深入敌后的敌后，依靠和发动群众，争取瓦解日、伪军，在敌战区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尔后对日寇的反攻夺取人民的胜利创造条件。为此，我太行四分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组建了敌工站，并选调了一批干部骨干，分别派遣到敌人的内部和日、伪据点的外线，开展了对日、伪的艰苦斗争。

我们是在长治敌工站，属太行四分区敌工站的一个分站（分区敌工站下辖长治、潞城、壶关三个分站）。长治不仅地处中心，而且长治全境均为日寇所控制，日、顽又合流，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顽固势力在伪组织中占据着很大优势。这种形势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繁重性和艰巨性。分区敌工站先后选调了二十多名干部加强长治敌工工作的力量。长治敌工分站起初是由郝一针同志代理分站长，四三年调胡天和同志任长治分站长，郝一针同志分管内线工作，四五年为配合我军解放长治又调焦万里同志为长治分站的副站长。敌工站的工作分内线和外线，潜伏于日、伪内部工作的为内线，活动于日、伪据点周围工作的为外线。当时在长治潜伏于敌人内部工作的有：原任平顺县独立营营长的曹志友同志，于一九四三年从原籍河北带着爱人为掩护绕道到长治，打入伪警察所当了警察，并利用警察的身份打击了日、伪内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曾一度取得了日、伪的信任当了班长。以后因暴露，于一九四四年由组织上决定主动撤离，王文焕同志于一九四三年打入日寇设在老顶山的据点，当了维持会

的“记帐先生”〈书记〉，并完全掌握了维持会，至一九四五年二月出色地完成了里应外合的任务，拔除日军据点为止；张汉俊同志于一九四二年打入了伪长治保安二中队当了庶务中士，并积极创造了起义的条件，一九四五年春因组织起义暴露被迫撤离；张英华同志由兄弟部队派进长治，打入伪警察署当了督导员，直至长治解放，还有贾丰、马培文、王友光、裴成业等同志也是于一九四二年即打入了伪组织内进行内线工作的。在内线工作的除了直接派遣的干部外，还有我们敌占区物色培养和在伪军内部发展的爱国青年：成贺喜、王文宪、李冬生、申龙根、张有河、吕根明等同志在伪保安二中队积极开展了内线工作，长治秦家庄的史水则和苏店的张贵生被派遣在苏店伪区当了区警，潞城的成玉山被派遣到长治伪警察训练所当了书记；其它还有不少同志接受我们派遣或原在日、伪内部工作接受我们直接或间接领导进行了工作，遗憾的是现已记忆不起。外线工作是根据日、伪的布防情况而活动的。当时日、伪除驻守长治城外，在苏店、高河、韩店、唐皇岭、韩川、五谷山、李坊、荫城、老顶山等地均设置了据点。我们在外线工作的同志是：李福海、郭世栋、解永瑞等同志活动于荫城、韩店周围由焦万里同志分管；何启明、薛野萍、郭炳喜等同志活动于苏店周围和城东南山头一带；王仁和、梁捷、严忠嗣等同志则在城东和城东北的小辛庄、山门、关村一带；郝一针同志除经常出入于长治城同内线联系外，也常活动于山门、关村以及老顶山下的东岸村、黄花掌等地。在外线活动的还有景继福、丁秋林、付启山、张来聚等同志。北董的申大顺、中山头的裴双有，坡头村的李起富，苏店的宋德只等同志也参加过敌工站的工作，就地进

行活动。长治分站还调配了王世怀、田四则等同志为通讯员，他们也是经常出入于敌占区，起着重要的地下交通作用。

在内线和外线，我们都是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对日、伪军工作的。我们曾经对伪保安队进行过典型调查，调查表明伪军的下层绝大多数拉壮丁被迫参加伪军的，而中上层多数投靠于日寇和国民党的顽固派，少数也有民族正义感的。根据调查，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伪军基层的士兵、班长，同时也不放弃对中上层的争取团结，利用中上层的关系掩护基层工作。在内线主要采取广交朋友以及个别争取教育的方法同伪军的基层建立一定的关系。在外线则通过伪军的家属、亲朋好友以及革命两面派的基层政权，去做日、伪军的争取工作。

长治全境都是敌占区，没有我一块根据地。日寇为巩固它的殖民统治，在敌占区多次实行“强化治安”，对内强化警宪活动，对外多次搜捕我方工作人员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国民党顽固派县长聂士庆率众投日，日、顽合流后，蒋介石、阎锡山的顽固势力，勾结日寇对我方人员严加监视和迫害，更增加了我们的工作上的困难。由于敌人的严密控制，我们同内线的联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九四三年初由郝一针同志负责两次试图在城内建立联络点均未成功。一次是在西关长发栈，以货栈为掩护进行内线联系，但敌便衣暗中窥探，发现郝一针同志可疑，突然进栈检查，查出一个小本子和一个外文图章。郝应付说“这是特务机关某同学到北京去了，委托我代保管一下的”某便衣说“是自己人没关系不用怕”等，郝假装解手从后门脱离险境，两个便衣得到

掌柜一笔钱后，才放过走开。另一次是城内东北角开设了一个磨坊，以磨面为业掩护活动。一天突然一个便衣进门来找郝一针同志借钱，郝当时外出未归，店员说“我们这铺子不赚钱，还亏本呢！”该便衣说“我知道你们这买卖越亏本越好”，这个便衣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活动，但当时他没有等到人，表示“今天走了，明天再来”。郝一针同志回磨坊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及时离开磨坊，结束了在磨坊联络点的活动。在当时敌人的严密控制下，打入日、伪内部，取得合法身份，并利用合法进行革命活动，其困难和危险性可想而知，如果我们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一九四四年内线上部裴成业长时间没有联系，有一次我们利用中山头村赵复孟同裴成业的亲属关系，派赵复孟进城给裴成业送一个要其撤离内线去学习的小纸条（写纸条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当赵复孟进城时遭到城门军警的严密盘查，结果被搜到了小纸条，赵复孟遭敌逮捕（后送太原死于狱），接着裴成业被捕，随后由于裴成业、王友光、马培文、贾丰过去就相互认识，敌人对他们的活动也有所察觉，因之均先后遭敌逮捕。一九四五年五月，我们曾组织伪保安二中队的起义，不慎暴露，我内线人员申龙根、李冬生、张有河、吕根明遭敌逮捕枪杀而壮烈牺牲。这些同志的牺牲和被捕使内线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在外线，由于日、伪封锁清剿，我们的活动也是艰难的。我们经常是利用晚间摸黑通过敌人的碉堡下、越过敌人的交通要道，才能深入敌占区。在敌占区也多是利用晚间时间进行工作，工作之后又要趁夜深人静时转移地方才能休息。虽然如此，由于敌人频繁地清剿包围，也曾使我们的工作遭到过很大的挫折。我们先后在长治敌工站工

作的二十多名干部就有六名在敌人的清剿包围中遭敌逮捕或只身与敌博斗而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使我们的外线工作也受到了痛心的严重的损失。

我们的工作是艰巨的，斗争是严酷的，受到过很大挫折和损失，但抗日的怒火扑不灭，人民是要抗日的，人民寄希望于我党我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掩护并大力帮助了我们的工作，特别是中山头、南、北、小山头、北董、焦家庄、南北石槽、山门、关村、小辛庄、津良寺、苏店、平顺县的东禅村、长子县的大关村等以及许多村庄的人民群众，都给了我们永志不忘的大力援助，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我们组织了伪保安四中队驻高河第二小队里应外合的反正起义。高河据点是敌人在长治西南的一个屏障，西临漳河，地处长治到长子的交通要道，但是较为孤立，距城稍远。经过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在高河伪保安小队我们已经同王根云、好旺等建立了内线关系，当时伪小队长冯大元与王根云等关系恶化，我们利用这个矛盾促使了王根云等的反正起义，九月十三日由薛野萍、何启明同志带领了山头、北董、石槽等村的申大顺、常端午、王过继、郗小消、张贵米、李福民、贾秋保等一批青年组成的接应队，于晚间由山头村出发至高河，利用伪小队长夜间不住碉堡内和士兵熟睡的时机，由内线关系值班站岗，接应队抵达后，按讯号上了碉堡的一、二、三层，并把所有武器传递至碉堡下，尔后叫醒了全体士兵，命令走出碉堡，集合站队，薛野萍、申大顺到宿舍捆绑了伪小队长冯占元，未发一枪即将全队由高河经原家庄、北董、山头、乌集头带到了我平顺根据地。计全小队拉出士兵23人，携带机枪一挺，步枪21枝，电话机一

部，自行车两辆。

一九四五年二月，根据军分区的命令，我们同分区侦察队，平顺县独立营组织了对老顶山日军据点的里应外合，歼灭日军一个班。老顶山北临潞城县境，地处长治、壶关、平顺的交界，距长治城约15华里，从山下到山顶约八华里，山的最高峰有古庙一座，耸立顶峰，是据守长治城至关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日寇进犯长治后，即侵占了该庙，设置了据点，在庙内外构筑了工事，严密设防，庙内有上下两院，日寇在上下两院必经的阶梯要道口特制了一扇数百斤重的大盖板，上院筑有炮楼，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山碉。日寇依托这个据点，踞高临下，西可俯瞰长治大片盆地，东可封锁袭扰我根据地，对我威胁很大，但据点内，我早已潜伏了内线干部王文焕同志，并掌握了据点内维持会的所有成员，而且东边山下紧靠我平顺县根据地的东禅村，利于我里应外合。一九四五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胜利的前夕，我各解放区已开始了对日寇的局部反攻。为消除老顶山据点对我的严重威胁，并为尔后全面反攻创造条件，太行四分区决定里应外合消灭日寇，拔掉这个钉子。根据分区的命令，组成了以分区侦察股长江涛同志为总指挥，有平顺独立营营长苟再合、敌工站胡天和等同志参加的指挥小组（平顺独立营教导员何积功、侦察队队长王玉琦、敌工站郝一针等同志亦参加了里应外合的工作），并以平顺独立营、分区侦察队为外合部队，以内线王文焕同志并加派独立营贺排长和分区侦察队的侯金库、申小三同志化装进庙作内应。按照计划，阴历正月十五日，由王文焕同志以维持会的名义，利用中国的传统节日邀请鬼子在上院和下院间的窑洞喝酒吃饺子，诱使鬼子走

下了上院。脱离了炮楼、武器。贺排长、侯金库和申小三则于当天上午携带手枪、手雷伪装送柴烧火的群众进入了庙内。战斗前一天的夜间，指挥组、独立营、侦察队隐藏在山腰间的一户居民窑洞和佛儿坪山的坑道，独立营的一部埋伏于长治通往老顶山的要道黑虎店一线，阻敌增援。中午十时许，日本鬼子全部应邀吃饭，但一个鬼子意外地去上院取酒杯，发现我隐蔽于阶梯通道口盖板侧的两个侦察员，鬼子当即惊叫并与我侦察员搏斗，我侦察员当即开枪未击中，鬼子狼狈逃向庙内（鬼子躲在一个隐蔽的地下洞内未被发现，后逃回城内），与此同时，我另一侦察员迅速地放下通道的盖板，王文焕等同志跟着打开大门接应突击队，其他鬼子听到叫声即向上院冲击，但由于盖板已截断敌人的通道，我侦察员又从盖板上开枪射击，投掷手雷，使鬼子无法拿到武器占领上院阵地，我突击队听到枪声也迅速冲进庙内，鬼子则以酒瓶、砖头打死顽抗，但均被我一一击毙。我胜利地歼灭日军一个班（共十一人，只一人逃跑），缴获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一挺，步枪十枝，我军无一伤亡。从此，拔除了这个据点，为解放长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们组织了韩店伪保安第二中队的起义（未遂）。韩店地处长治南部的腹地。伪军依托韩店控制了长治南部的大片村庄。该中队除潜伏了我内线干部张汉俊同志外，并有李福海、郭炳喜等同志分别从敌占区物色打入该中队的申龙根、李冬生、王文等同志，经过张汉俊等同志的长期工作，争取了伪保安二中队的大部分人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寇宣布投降，国内我各战场均纷纷出击，解放了大片国土，日寇面临覆灭，组织伪保安二中队的条件业已成

熟。经过敌工站站长王培仁同志同意，决定内线由张汉俊同志积极组织准备，外线由焦万里同志负责派李福海同志接头联系。但在起义前一天的当天上午由于我方人员不慎露了机密，被奸细王和尚发觉，即向中队长辛忠梓告密，我内线人员八人遭敌逮捕，其中四人遭敌杀害，张汉俊、贺成喜、王宪等同志及时撤离险境，起义失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日、伪内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其战斗力大大削弱。

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十四（阳历8月21日），我站同荫城区委组织了驻李坊伪上党保安总队直属队（原陵川保安中队）的反正起义。一九四五年六、七月，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李坊伪保安中队长王永高等为寻找出路，于七月初即找我方联系。经李坊我方村长姜有才同志与李福海同志联系，李福海同志进入李坊据点与中队长王永高接了头之后，经过考虑，发给军分区印发的保证书。农历七月十四日，由中队长王永高带领该中队104人，机枪一挺，步枪40余枝，至沙浴村，由荫城区委副书记郭永兴同志率领区干队及民兵近百人接应。当天从沙浴到南池子，又由长治独立营派部队迎接至壶关固村，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对李坊伪保安中队的反正起义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为配合我军解放长治进行了城内的内应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而蒋、阎、日合流，八月二十三日蒋、阎派重兵侵占了长治，窃取了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我刘、邓大军调集上党地区，先扫了外围，尔后准备攻取长治城。为配合攻城，我长治县委把城工部在城内有关的地下关系移交敌工

站，敌工站则由焦万里、郝一针、李福海、梁捷等同志潜伏到城内，并由焦万里同志统一指挥，任务是与伪上党道保安总队付总指挥张隆华以及一个伪保安中队长和伪警察所内的内线关系取得联系，并组织内应，他们按计划于上党战役前夕的九月初先后进入了长治城。进城后，梁捷同志活动于城内外，没有固定的隐蔽点，但经常向上级机关汇报了有关蒋、阎军在长治布防的情况。李福海同志进城后，由潜伏在东街一个饭馆的区干队员冀其顺同志护送，住城内该饭馆任经理的城工部工作人员李宝珠同志家里，后转移到北街王二洪、王庆则家，并与伪上党道保安总队付总指挥张隆华取得了联系。张隆华原是长治特区区长王玉山、区委书记鲍德山经关村村长王连生通过王二洪、王庆则发展的一个内线关系。当时敌军多次搜查，王二洪、王庆则不顾全家的性命安危，千方百计地掩护李福海同志隐蔽在西房的顶棚上，并由地下党员冯银林和城工部的地下关系冯书长协助，通过张隆华及其下属付官王子华、朱宏亮等开展了搜集情报，发动水厂工人护厂，保护敌伪档案以及营救我方被捕人员等的活动，焦万里、郝一针二同志进城后，以地下党员孟智慧所在的东街羊汤馆为掩护，作为活动的联络点。但进城后尚未来得及开展工作，便遭到敌军侦探的怀疑，在羊汤馆被捕，只是由于没有暴露身份，被关押一个月，于蒋、阎军逃跑的前夕找保释放。九月下旬，正当我大军准备攻取长治城之际，阎锡山派重兵沿晋白线向长治增援，我刘、邓大军则挥师北上，于十月上旬一举歼灭了阎军主力三万余人，长治被困的敌军则慌乱一团准备逃窜。在敌军逃窜的前夕，焦万里同志已由潞城敌工站派遭到长治伪警察所任书记的成玉山和在伪警察署任督察长的

城工部地下工作者马占元以及在敌政卫团任职的地下关系常之明保释。焦万里同志被保释后，由马占元、张英华协助，通过阎军保安五团一个王蓉长的关系，经过其管的城防地域，以绳索吊出城墙，返归敌工站，并及时向攻城指挥部汇报了敌军准备逃窜的情况，与此同时，郝一针同志亦趁敌军混乱之际，在敌军西窜的当晚，及时返回敌工站，向部队提供了敌情。由于情报及时，使我军胜利地堵截追歼了仓惶西窜的敌军。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夜晚，蒋、阎军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弃城西逃，我们敌工站于十月九日拂晓便进入了为日、伪盘踞六年多，尔后又为蒋、阎军抢占一个多月的长治城，从此结束了我们敌工站在敌占区历时四年的战斗生活。在这四年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对解放长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付出了血的代价，特别是处士日、顽、我三面斗争地区的长治敌工站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长治敌工站的丁秋林、何启明、严忠嗣、王仁和、郭世栋、薛野萍等同志以及打入日、伪内部的申龙根、李冬生和内部发展为我地下工作的张有河、吕根明等几位热血青年，先后在尖锐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了。他们为解放长治解放全中国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无愧为敌工战线上英勇的革命烈士，他们的英雄形象经常涌现在我们的脑际。

丁秋林同志山西长治县东和村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于贫农家庭，一九三七年夏参加山西牺盟会工作，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调太行四分区敌工站工作，同年秋后，不幸在长子县的小塘村，遭敌杀害于该村的村东，牺牲时年仅23岁。

何启明同志长治西申家庄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曾任长治牺盟会的干事、党组成员，作过党的组织工作和长治县的区委书记。他善于接近人，能以诚相见，很忠肯，爱学习，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好干部。一九四二调敌工站工作，积极深入，经常在敌占区的苏店一带活动，他和薛野萍同志在山头、北董等村团结了一批青年，一九四三年去接应高河伪保安小队的反正起义，就是由他们团结的一批青年。但不幸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初，在南董村遭敌包围逮捕。被捕后，伪县长谢芳声亲自过问，并软硬兼施，妄图迫使何启明同志屈降，但何启明同志坚定不移，威武不屈。最后，日寇竟以灭绝人性的暴行，把何启明同志作为“活靶子”，用刺刀残杀于苏店。何启明同志就义时年仅20余岁。他的壮烈牺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严忠嗣同志浙江绍兴人，学生出身，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南方奔赴北方，参加了抗大，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新一旅工作。一九四〇年曾在新一旅政治部任军法干事，一九四三年调长治敌工站工作。他举止文雅，为人忠厚、和气，能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工作积极，不畏艰难，他刚到敌工站便积极要求深入敌区开展工作。一九四三年秋，他随同另一个同志第一次深入敌区，在城东的冀家坟附近遭敌包围，他人生地不熟，近视眼，与随同的同志失散，在秋庄稼地里不幸遭敌搜捕。严忠嗣同志被捕后，虽然身陷囹圄，但仍然坚持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看守以及同狱人积极宣传抗日的道理，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由于日伪的摧残折磨，重病缠身，年仅20余岁的严忠嗣同志，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就义于长治日寇的监狱。